

立兴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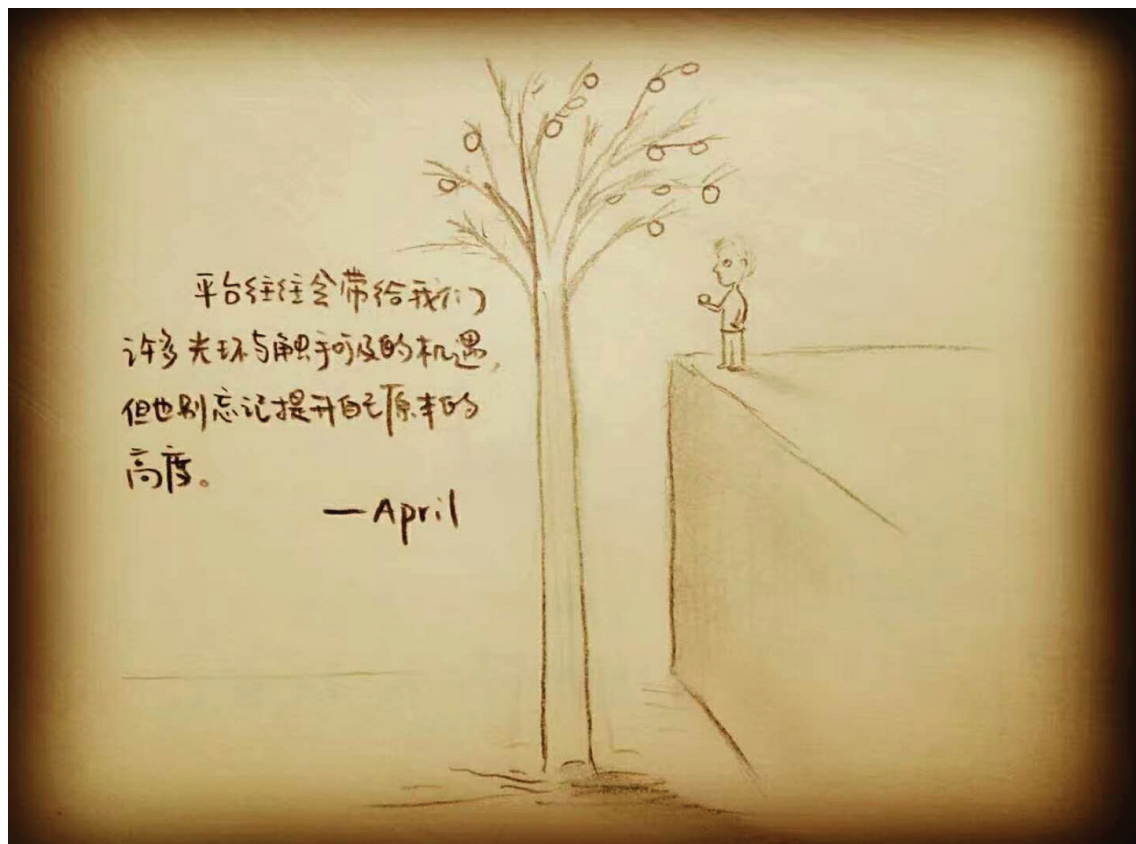
文：陈立兴 画：陈明

约瑟夫是孤的好兄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步为经济发展的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是，经济理论研究却始终没有摆脱“亦中亦西”或“不中不西”的两难处境，既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又要时刻注意与国际接轨；既要努力坚持中国特色，又要积极学习西方理论；既要有定性分析做框架，又要有定量预测做支撑，这种两难问题在经济学研究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甚至可以说是已经病入膏肓了。

翻看中国早期的经济学书籍，满篇都是以黑体的马恩列斯语录开头，最后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后来，西方经济学理论逐渐时髦起来，写文章的时候引经据典仍然是最主要的方法，古典的，然后是新古典的，边际的和很多不着边际的理论一股脑儿摆出来，各说各话，似乎都有道理。理论界的混乱必然带来实践中的瞎折腾。刚说完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就开始强调宏观调控措施主要依赖市场手段实现，效果不好马上又加上一句“还要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话音未落，掌握行政权力的大小市长们又开始坐飞机到国内外找“市场”。折腾了一阵，最后都和“达芬奇家具”一样变成浮云了。写文章的时候不管是拉大卫·李嘉图还是保罗·萨缪尔森助阵，都没人信了。

于是，各级经济学工作者为了各自的目的，开始引入数学和计量方式增加自己文章的科学性、精确性和可靠性。上一点“档次”的经济学杂志，变成了专业的数学杂志和统计学杂志。写经济学的文章，如果没有几个模型，不做计量分析，根本就不好意思拿出来，人们把这种现象戏称为“拿数学做经济学的遮羞布”。结果是，上帝造的蛇使亚当和夏娃失去了天真，“经济学者”则是画蛇添足，使经济学人热衷于串串冰冷的数字，失去了固有的“人性”。多数模型与前面的引经据典并无差别，都是故作高深而已。



何洁的小说《落花时节》里有一段文革时期用京剧演绎列宁和斯大林在一九一八的故事情节很有意思，“叫一声约瑟夫孤的好兄弟，有件事朕同你细说端的。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切不可闹意气贻误战机。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全部是大理石雕刻成的。”“尊一声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三日前本将军已传下话去。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开枪不能朝着墙上的裸体，

那都是尼古拉留给咱们无产阶级的。”

这个情节记录的是荒唐年代的荒唐事，但是几十年后，当我们读那些言必称凯恩斯、弗里德曼等洋人名，下笔就是xyz、@#%*&等洋字码的经济学文章时，和看这段唱词有差不多一样的感觉——明明是地道的京剧，观众也是地道的中国人，却要口口声声说“约瑟夫是孤的好兄弟”。

(←上接B2版)

让先生更加郁闷的是从去年开始失去了与进生的联系。说起来自从先来美，一直得到在国内当文科教授的进生的支持，比如寄国内的论文资料等，也曾数度承他邀请回国讲学。作为知根知底的挚友，他们有说不完的话，考上77级大学生以前先生每周都去进生家见面。晚上告别后往往是进生先送先生回家，送回家后话犹未尽，先生又把进生送回来再一人回家。先生来美后两个好友也从未间断过意见的交流，从苏联和东欧的变天，1989年的“六四”，1998年的洪灾，美国的911，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和2012年开始的“知青治国”。很多年里，我先生每周六晚（国内周日早）一定用电话卡给进生打一次电话，一谈就是1~2个小时。因为手机的普及，我们家于2012年取消了地线电话，不能用电话卡了，于是，他们的联系就少了很多。后来微信出来了，人们不论相隔天涯海角，通话视频易如反掌。先生和进生虽然开通了微信，也交换过几次照片和信息。可是进生从未主动联系过先生。从去年夏天以后，即使先生转发资料，或询问陈妈妈的近况，进生那里也没有反应。“都是你插嘴惹的祸”，我对先生说。先生铁青着脸，又开始动不动

就凝视着空中不说话。

大概是实在憋不住了，后来一次晚饭时先生主动和我谈起此事，说他认为进生拒绝与他联系可能另有原因。先生的话让我想起他和国内几位朋友间发生的不愉快。近年来，先生一边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感到鼓舞和骄傲，同时也对不少事情感到困惑和担忧，很希望与国内的朋友交流。不料交流过程中先生与几位朋友产生了矛盾。比如2012年《纽约时报》爆料温家宝家族利用他的职位谋取暴利时，中国政府驱逐了爆料的记者。对中国政府为何不公开温总理的财产以正视听，而是驱逐爆料记者的做法先生不理解。他和国内一位小学同学谈论此事，不料那位同学认为我先生是受美国反华势力利用，让他说话当心。前年元月川普上台伊始，先生在《川普与美国媒体的对决》的时评中联系习近平“中国媒体必须姓党”的要求，引用美国教授Jay Rubin的研究指出“一个国家最危险的莫过于当它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一位大学同学说我先生这是“妄议”总书记。先生当时就对我表示他对这些同学的意外和失望。三年前，那位官至省厅级的小学同学在王岐山“杀回马枪”时跳楼自杀。那是我先生朋友圈中的第一个贪官。这个惊人

消息传来，先生对国内的事物感到更加困惑和担忧。

“我去国太久了”——他有时这样自言自语。先生的意思是进生拒绝与他联系可能是因为进生与他观点不同，可是又碍于挚友的面子不便直说，于是采取了回避策略，避免发生冲突。如果先生的猜测是对的，进生的回避不仅无助于消除两位挚友间的误解，而且断绝了一切关于陈妈妈的消息等于是要了我先生的命。

“唉——”身边的先生又叹了口气，翻了个身。我一看床头的钟，已经清晨五点半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这两位著名物理学家的决裂是中华民族的一大遗憾，据说连周总理都没能让他们和解。我先生和进生虽然没有杨振宁和李政道那样的名气，可是珍视友情之心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和毛泽东、林彪、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一样，习近平的功过自有历史公断，不应该成为两个几十年挚友绝交的原因。躺在床上的我突然心中涌动起一种使命感：我决心用我的力量解开先生和进生之间的结，为我先生和进生这两个挚友，也为陈妈妈。我希望晚年的陈妈妈看到小时候在汉水桥推人力车的两个伙伴今天依然是好友，而且都有机会为她老人家尽他们应尽的孝心。